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音学史研究

刘青松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近20年来,古音学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对整个古音学史的论述更加全面系统;另一方面,产生了一大批对个别古音学家进行深入探讨的专门性论文,这些论文不仅关注顾炎武、段玉裁等著名古音学家,而且对一些在古音学上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如蒋骥)或颇有争议的学者(如朱熹、杨慎)也多有涉及。

关键词:古音学史;清代;宋代;明代

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3)01-0136-04

古音学是汉语音韵学的分支学科之一。较之其它两个分支学科(今音学、等韵学),它的历史更为悠久,成果也更为突出。一般认为,关于古音的研究,汉代已萌芽。到了宋代,古音研究成为专门的学问,产生了古音学。至清代,传统古音学取得的成就达到巅峰。清末,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引入,古音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毫无疑问,这历史悠久、硕果累累的古音学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传统古音学尤其是清代古音学进行探索,商务印书馆于1930年和1938年先后出版了张世禄的《中国古音学》^[1]和《中国音韵学史》^[2],这两部书都对中国古音学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性评述。同时期的一些音韵学通论性著作也或多或少地论述到明清学者的古音研究,如王力《中国音韵学》(1936)^[3]。然而,就某一问题或某一古音学家进行讨论的论文非常罕见,据笔者了解,只有董同龢在1934年《清华周报》第42卷第2期上发表了《段玉裁的古音学》。从解放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间,古音学史的研究倍受冷落,几乎是一片空白。

进入80年代,为了振兴汉语音韵学,学者们感到应该认真总结前贤的古音研究成果,并借鉴其研究方法。于是,古音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古音学史研究,除了对古音学史(尤其是清代古音学)做整体评述之外,更多的是对个别古音学者的深入研究。

一、关于古音学史的整体论述

对整个古音学史做全面述评的主要是两类著作:一是语言学史著作;一是音韵学通论性著作。

近20年来出版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主要有:王力《中国语言学史》^[4]与《清代古音学》^[5]、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6]、胡奇光《中国小学史》^[7]、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8]与《中国现代语言学史》^[9]和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10]等。王先生的《清代古音学》总结了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以及姚文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夏忻等的古音学成就,并指出了他们的不足,是关于清代古音学最全面的研究。何先生和李先生的著作也颇有特色。关于清代古音学,何先生不仅论述大家,而且还对毛奇龄、邵长蘅、柴绍炳以及龙启瑞等少有人论及的学者的成绩与局限做出了较为详密的分析。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何先生系统地论述了高本汉、陆志韦、李方桂、董同龢等人关于上古声韵系统的构拟,并且对20~30年代古音学上发生的两次大辩论做了详细的评述,是其他语言学史著作所不及的。李先生《汉语语言研究史》不局限于对古音学家的研究做出客观的评价,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他们之所以取得成绩或存在不足的原因。如在谈到明代陈第为什么未能归纳出古音体系时说:“从审音上看,陈氏受闽方言的影响,析音不准也是原因,……从思想方法上看,陈第没有把他的归纳法贯彻到底,在注重个别存在的

证据归纳的同时,忽视了音理间联系的归纳。”^{[10](180)}

这一时期的音韵学著作比语言学史著作更多,有数十部。其中论述比较全面而又系统的当推赵振铎的《音韵学纲要》^[11],该书第二部分“上古音的考订”基本上是叙述前人的研究,其中“古韵的分部”章论述从宋吴棫到现代王力的古音分部,并比较各家的异同及优劣。“古声类”章探讨了清代钱大昕、邹汉勋,近现代章炳麟、黄侃、曾运乾、钱玄同以及当代周祖谟、李荣等关于古声类的研究,较之其它只述及钱大昕、章炳麟与曾运乾等3人的著作略胜一筹。“四声”章对“四声一贯”“古无去声”“古无人声”“古四声不同于今四声”等说法一一进行评析。李葆嘉的《当代中国音韵学》^[12]在古音学史的评述方面最有特色,该书对其它著作中往往语焉不详的“传统古声纽研究”给予了特别关注。该书将传统古声纽研究分为“萌发初探期”“立论创说期”和“系统集成期”等3个阶段,对顾炎武、毛奇龄、徐用锡、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钱坫、李元、夏燮、邹汉勋、章太炎、黄侃等众多学者就古声纽的论述逐一加以评说,与只关注钱大昕等少数几人者大相径庭。其《论清代上古声纽研究》^[13]一文论述更为详尽。

二、关于清代古音学者的研究

清代是传统古音学的鼎盛时期,而成就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著名学者身上。以前,关于个别古音学者的专论是非常罕见的。近20年来,学界对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学者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顾炎武被公认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首创“离析唐韵”,以《诗》韵为依据进行古韵分部,以及有关入声等的论述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张民权《顾炎武古音学考论》^[14]对顾炎武的古音学思想、成就及局限做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可谓是“顾氏之功臣”。还有探讨顾氏某一方面的论文,如朱晓农《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15]、陈燕《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16]等。

在清代学者中被誉为“说文四大家”之一的段玉裁,其古音学成就也是最高的,有关他的研究也就更多。据不完全统计,关于段氏古音学的论文有20余篇。其中全面论述的有:李文《段玉裁古音研究考论》^[17]、李恕豪《论段玉裁的古音研究》^[18]、钱曾怡《段玉裁研究古音的贡献》^[19]等。李文论述最为全面

且深入,文章对段氏的“支脂之三分”“异平同入”“古无去声”“同声必同部”以及合韵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创见之处颇多。就段氏古音研究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的如:李尚行《试论段玉裁“支脂之三分”说阐述的偏颇》^[20]、李文《论段玉裁的古异平同入说》^[21]、陈燕《试论段玉裁的合韵说》^[22]等。吴庆峰《段氏古韵研究方法论》^[23]总结了段氏的古音研究方法。朱承平《段玉裁的古声类观》^[24]收集整理了散见于《说文解字注》中的材料,探讨段氏关于古声类的研究,认为“段氏在古声类的研究上是颇有创见的,并非‘多于古韵之功深,而于声少所发明’。”

江永、戴震二人也是清代有独到之处且成就较大的古音学家。关于江永,最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李行杰的《江永音韵学思想初探》^[25],该文综观江氏的古音研究,认为江氏古音学之所以比顾炎武精密,“原因有三:1)进步的语音史观和较先进的方法;2)用等韵分析古音又证以诗韵;3)用方音说古音”。该文还论述了江永古音学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一是“开了古音学上审音派的先例”,二是其“异平同入之说开阴阳对转之先河”。李开、张惠荣《江永对〈诗经〉韵例的研究》^[26]一文对《古韵标准》中江氏关于《诗经》韵例的分析进行评述,深化了对江氏古音研究方法的探讨。关于戴震,李开先生做了全面而又系统的考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主要有:《论戴震的古音学》^[27]《论戴震入声韵独立》^[28]《〈声类表〉考综》^[29]等。李先生还就戴震的语言文字学撰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专著《戴震语文学研究》^[30],将近一半的篇幅是讨论戴氏古音学的,它综述了戴氏在古音学方面的成就。在古音分部方面,“和顾、江相比,戴的最大进步是阴阳人相配十分完备。”^{[30](129)}“戴震的古韵分部对后世影响极大。”^{[30](140)}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先生还对《声类表》的有关问题以及戴氏入声独立、祭部独立等问题做了专门论述。

章炳麟、黄侃被认为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靳华《论章太炎的古音学》^[31]探讨了章氏“娘日二纽归泥说”“脂微分部”以及对转和旁转等音转理论,是对章氏古音学的最全面、系统的评述。论及黄侃古音学的论文有十数篇之多。丁忱《黄侃古音学研究》^[32]着重讨论了“古本声”十九纽的确定、“古本韵”28部的拟定、照系二、三等上古归属的论定和上古调类平、入的判定等问题。赵克刚《古本声述学》^[33]结合现代古音学家高本汉等的研究成果对黄氏的“古本声”十九纽进行深入探讨,充分肯定了“古本声”学说。黄孝德《“古韵28部”说的理论依据及其历史线

索》^[34]通过对古音分部历史的分析,指出:“黄侃的古韵28部说,是清代顾、江、戴、段诸儒古音研究的一个合理的继承和发展。”李开《黄侃古音分部对戴震的继承和发展》^[35]更是阐述了黄氏在古韵分部、古韵阴阳入对转理论的阐发等方面所受戴震的影响;其《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36]着重分析了黄氏求古本声与古本韵的逻辑方法,论证了黄氏“求本纽时未涉及古韵部问题”“确立古本韵时未涉及古本纽问题”,有力地批驳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认为黄氏采用循环论证的观点。

除顾、江、戴、段、章、黄等著名古音学家之外,也有文章对一些并不引人瞩目的学者的古音研究进行讨论,如李葆嘉《论李元的古声互通说》^[37],谢纪锋《蒋骥古韵学述评》^[38]。

三、关于宋代古音学者的研究

宋人吴棫的《韵补》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的古音学著作。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音韵学通论性著作中,凡谈及古音研究,都认为始自吴棫。周祖谟1966年出版《问学集》,其中《吴棫的古音学》^[39]一文对吴氏的古音研究做了简要的评述。近20年来,学界对吴氏古音学的探讨更加全面、深入。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思敬《论吴棫在古音学史上的光辉地位》^[40]、赖江基《吴棫所分古韵考》^[41]《吴棫的古音观》^[42]。李文总结了吴氏的古音研究方法,得出了“举全面发明古音学研究方法之功而归之于吴棫是毫不过分的”的结论。学界普遍认为吴氏《韵补》中的“通”与“转”都是其古韵分部的依据,由此定其所分韵部为九部。而赖文《吴棫所分古韵考》则认为,吴氏的“通”与“转”是有区别的,“通”是韵部合并的依据,而“转”则否,因此,吴氏所分古韵实为十四部。赖氏将此十四部与清代吴焘等人所编的根据宋词用韵归纳整理而成的《学宋斋词韵》以及《中原音韵》进行比较,发现其间大同小异。所以他说:“吴棫在《韵补》中所定的古音系统,与清代以来的古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孙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以及今人王力根据《诗经》《楚辞》等上古韵语和《说文》谐声系统所归纳出来的古韵系统是大相径庭的。”在他看来,吴棫的古韵分部是以今律古的产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古韵分部。正因为如此,所以赖氏又发表了《吴棫的古音观》一文,文中说:“吴氏对古音的研究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这只

是次要的一面,其主要方面则是应该加以否定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古音观导致他的研究走进了死胡同,无论是处理材料的观点和方法,还是所分的古韵和所定字的古音都是不科学的。”这与李思敬先生的观点颇为不同。

在古音学史上,宋代学者中只有吴棫、程迥和郑庠占有一席之地。朱熹往往被视为“叶音说”的集大成者而受到批判。近年来,陈鸿儒对朱熹《诗集传》等著作中的“叶音”做了穷尽式的分析,并将它们与后世某些著名古音学家所考定的古音进行系统的比较,撰写出多篇有理有据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见解。在《〈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43]中,陈先生根据“叶音”情况,考得朱熹古韵十三部、入声八部,并将其与顾炎武所分古韵十部比较,认为朱氏的舒声韵十三部从“离析唐韵”的角度更优于顾氏,而接近江永的十三部。《〈诗集传〉叶音辩》^[44]一文通过将朱氏叶音与明陈第《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著作所注古音进行系统比较,发现“朱的叶音与陈第所考古音是高度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陈先生认为“《诗集传》叶音就是朱熹心目中的《诗》本音”,“朱熹的叶音就是朱熹心目中的古音,‘叶’字不过是押韵的意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还在朱熹的《楚辞辩证》中发现了朱氏注明为“古音”而与他在《楚辞集注》中“叶音”一致者^[45],如《楚辞辩证上·离骚经》中对“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几句注有这样的话:“古音能,孥代叶,又乃代。……徐铉云:‘古之字音多与今异,如自亦音香,乃亦音仍,他皆放此。’……夫骚韵于俗音不叶者多。”据此,先生说:“首先应注意的是朱熹提到了‘古音’这一概念,说明朱熹知道古有古音、今有今音。‘古音能,孥代叶,又乃代。’这句话旨在说明自己叶能为奴代反,是因为能字的古音为孥代切、乃代切。”“其次,朱熹引徐铉‘古之字音多与今异’,又言‘骚韵于俗音不叶者多’。这说明朱熹心里不但有古音、古韵的概念,而且认识到古今语音的不同。”这些都为陈先生的“朱熹的叶音就是朱熹心目中的古音”的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四、明代古音学史研究的展开

在古音学史上,明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由于明代的空疏学风,以往对这一时期的古音研究

状况关注不够,被学界提及的只有陈第的“音有转移”学说。笔者所撰《明代古音学论要》^[45]对许多零星且罕见的资料进行了梳理,系统地考察了明代陈第、杨慎、赵宦光、杨贞一、徐光启、方以智、王夫之等众多学者的古音学思想、研究方法及其实绩,首次对明代古音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另外《晚明时代古音学思想发微》^[46]一文就杨慎纠正错误“叶音”,陈第破除“叶音说”并提出“音有转移”,赵宦光、方以智认识到语音发展的阶段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阐述了科学的古音学思想的形成。

陈第在明代古音学者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古音学思想屡见于音韵学通论性著作之中。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论文,不仅探讨他的古音学思想,而且对其诸多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李恕豪《陈第古音研究探索》^[47]从陈氏的古音学思想、古音研究方法以及古声调观等几个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康瑞琮《“陈第持古无四声说”辨》^[48]则专门就陈第的古声调观进行探讨,反驳了以往学者的“陈第持古无四声说”的观点;笔者《论陈第对〈诗经〉韵例的研究》^[49]分析陈氏《读诗拙言》中论述《诗经》韵例的有关内容,并结合《毛诗古音考》所列韵例,参照顾炎武、江有诰、王力的有关分析,做出客观的评述。邵荣芬先生独辟蹊径,撰《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构拟音值的假定》^[50]一文,归纳出陈氏心目中的古韵韵部,比较其与宋吴棫、清顾炎武、江永等人古韵分部的优劣,对陈第古音研究的实绩做出了很好的评价。

除陈第之外,有专文论及的明代学者有杨慎、方以智等人。关于杨慎,李运益《杨慎古韵学》^[51]认为:“杨氏在古韵学研究的历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功绩不可磨灭。杨氏在古韵研究上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研究古韵的指导思想正确,在研究中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其实,杨慎并未“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李氏的评价有溢美之嫌。笔者的《杨慎古音学思想初探》^[52]一文肯定了他纠正错误“叶音”的做法,深入分析了他之所以提出“转注古音说”的原因,文章认为,“转注古音说”客观上为“叶音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杨氏“最终非但没有否定‘叶音说’,反而走上了‘叶音说’的老路”。关于方以智,李恕豪《从〈通雅〉看方以智的语言研究》^[53]简略地论述了方氏的古音学思想以及对古声类的初步探索,笔者《方以智古音研究考论》^[54]专门探讨了方氏的语音发展阶段性学说和关于古声类以及古韵分部等方面的问题。王夫之的古音学思想,是学界从未予以重视的,笔者《王夫之

与叶音说》^[55]就王氏《叶韵辩》一文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叶韵辩》是王氏对“叶音说”的全面的、总结性的批判,它充分体现了王氏的语音史观。

五、关于现代古音学的研究

对现代古音学进行整体论述最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是上文谈到的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另一部是杨剑桥的《汉语现代音韵学》^[56]。杨书“自序”中说:“先师张世禄先生于193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史》为一代名著,至今仍为世人广为引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先师只叙述到高本汉、马伯乐等出现为止。本书的叙述则是从高本汉、马伯乐等开始,而止于当代,因此本书是对先师《中国音韵学史》的继承和发展。”该书概括论述了高本汉及其以后学者关于上古声韵的构拟,检讨了于省吾、史存直、黄绮等现代学者就清儒古韵分部所提出的质疑,肯定了清儒古韵分部的成就:“清代学者在古韵分部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不但基本上是能够成立的,是反映了清代古音学高度的研究水平的,而且是高本汉以来的现代音韵学赖以立身并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继承的宝贵文化遗产。”

方环海《林语堂与中国音韵学的转型》^[57]对林语堂在古音学方法的革新方面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其不足。曹述敬《钱玄同的古韵学》^[58]对钱氏所分古韵二十八部及其所构拟的音值进行评述。陈新雄《曾运乾之古音学》^[59]论述了曾氏古音学与黄侃的继承关系,认为曾氏古韵三十部源于黄侃的二十八部,“声母方面,虽喻三古归匣、喻四古归定为其独见,实亦由于古声十九纽而来。”有关现代古音学的专门性论文较为少见,只有上述寥寥几篇。这应该是今后古音学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 [1] 张世禄. 中国古音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2] 张世禄. 中国音韵学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3] 王力. 汉语音韵学[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 王力. 王力文集·清代古音学[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 [6] 濮之珍.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胡奇光. 中国小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8] 何九盈.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9] 何九盈.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 [10] 李开. 汉语语言研究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 [11] 赵振铎. 音韵学纲要[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 [12] 李葆嘉. 当代中国音韵学[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 [13] 李葆嘉. 论清代上古声纽研究[J]. 语言研究, 1992, (2): 137-149.
- [14] 张民权. 顾炎武古音学考论[D]. 南京: 南京大学, 1997.
- [15] 朱晓农. 顾炎武的“四声一贯”说[J]. 温州师院学报, 1987, (1): 32-38.
- [16] 陈燕. 顾炎武对入声的认识及其影响[J]. 语文研究, 1998, (2): 38-42.
- [17] 李文. 段玉裁古音研究考论[D]. 南京: 南京大学, 1997.
- [18] 李恕豪. 论段玉裁的古音研究[J]. 四川师大学报, 1987, (6): 60-69.
- [19] 钱曾怡. 段玉裁研究古音的贡献[J]. 文史哲, 1985, (6): 69-73.
- [20] 李尚行. 试论段玉裁“支脂之三分”说阐述的偏颇[J]. 江西师大学报, 1985, (1): 73-79.
- [21] 李文. 论段玉裁的古异平同入说[J]. 古汉语研究, 1997, (2): 19-23.
- [22] 陈燕. 试论段玉裁的合韵说[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1992, (3): 57-64.
- [23] 吴庆峰. 段氏古韵研究方法论[J]. 山东师大学报, 1990, (1): 64-69.
- [24] 朱承平. 段玉裁的古声类观[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6, (3): 47-53.
- [25] 李行杰. 江永音韵学思想初探[J]. 青岛师专学报, 1984, (1): 73-81.
- [26] 李开, 张惠荣. 江永对《诗经》韵例的研究[J]. 语言研究, 1998, (增刊): 45-56.
- [27] 李开. 论戴震的古音学[J]. 南京大学学报, 1993, (4): 77-85.
- [28] 李开. 论戴震入声韵独立[J]. 古汉语研究, 1993, (1): 34-38.
- [29] 李开. 戴震《声类表》考综[J]. 语言研究, 1997, (1): 57-79.
- [30] 李开. 戴震语文学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31] 新华. 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C].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 [32] 丁忱. 黄侃学术研究[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33] 赵克刚. 古本声述学[J]. 重庆师院学报, 1985, (4): 59-71.
- [34] 黄孝德. 黄侃学术研究[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35] 李开. 黄侃学术研究[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36] 李开. 黄侃的古音学: 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J]. 江苏大学学报, 2002, (1): 91-95.
- [37] 李葆嘉. 论李元的古声互通说[J]. 徐州师大学报, 1991, (2): 119-123.
- [38] 谢纪伟. 蒋骥古韵学述评[J]. 中国语文, 1996, (3): 214-219.
- [39] 周祖谟. 问学集·吴械的古韵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40] 李思敬. 论吴械在古音学史上的光辉地位[J]. 天津师大学报, 1983, (2): 75-81.
- [41] 赖江基. 吴械所分古韵考[J]. 暨南大学学报, 1986, (3): 80-91.
- [42] 赖江基. 吴械的古音观[J]. 暨南大学学报, 1989, (2): 30-36.
- [43] 陈鸿儒. 《诗集传》叶音与朱熹古韵[J]. 古汉语研究, 2000, (1): 23-30.
- [44] 陈鸿儒. 《诗集传》叶音辨[J]. 古汉语研究, 2000, (2): 20-25.
- [45] 刘青松. 明代古音学论要[D]. 南京: 南京大学, 1998.
- [46] 刘青松. 晚明时代古音学思想发微[J]. 语言研究, 2001, (4): 18-27.
- [47] 李恕豪. 陈第古音研究探索[J]. 四川师院学报, 1985, (1): 51-57.
- [48] 康瑞琮. “陈第持古无四声说”辨[J]. 天津师大学报, 1986, (4): 76-79.
- [49] 刘青松. 广西语言研究[C]. 桂林: 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9.
- [50] 邵荣芬. 陈第对古韵的分部和音值的假定[J]. 古汉语研究, 1988, (1): 10-19.
- [51] 李运益. 杨慎古韵学[J]. 西南师大学报, 1990, (4): 83-85.
- [52] 刘青松. 杨慎古音学思想初探[J]. 古汉语研究, 2000, (3): 19-22.
- [53] 李恕豪. 从《通雅》看方以智的语言研究[J]. 天府新论, 1990, (2): 78-84.
- [54] 刘青松. 方以智古音研究考论[J]. 语言研究, 1998, (增刊): 57-64.
- [55] 刘青松. 王夫之与叶音说[J]. 船山学刊, 1998, (2): 13-16.
- [56] 杨剑桥. 汉语现代音韵学[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57] 方环海. 林语堂与中国音韵学的转型[J]. 中州学刊, 1997, (2): 87-90.
- [58] 曹述敬. 钱玄同的古韵学——关于《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J]. 信阳师院学报, 1982, (1): 46-58.
- [59] 陈新雄. 曾运乾之古音学[J]. 中国语文, 2000, (5): 399-406.

Research on histor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since 1980s

LIU Qing-s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ast 20 years, there have been grea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entire histor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ar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On the other hand, a great number of specialized papers on some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ists have come out.

Key words: histor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Qing Dynasty; Song Dynasty; Ming Dynasty